

《老乞大》和《朴通事》——在華語文教材史 上的歷史定位及現實意義

張德鑫

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

摘要

韓國漢語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不僅是東方國家中最全面具備外語或第二語言教學特點的漢語教材，還可被視作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比較正規、完整的華語文教材。本文從漢語史尤其是漢語口語史和漢語言文字學的角度、社會學和文化學的角度、華語文教學特別是世界華語文教材史的角度以及具體第二語言課堂教學的角度，對《老乞大》和《朴通事》進行多方位研析，以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溫故知新、推陳出新，對發展今天的華語文教學，特別是推動華語文教材的研究和編寫，做一些基礎工作。

關鍵字：外語教學、第二語言教學、口語教學、華語文教材

壹、前言

這裏所謂“華語文”，是指將漢語或中文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來教學，又稱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華語文教材史，由於種種原因，資料極少，尤其是尋找能符合我們今天概念上的古代華語文教材，在中國的古籍中甚是難覓；倒是在古代外國人編著的中文教材中尙能發現遺珠。如果說初版於 1867 年由英國漢學家威妥瑪寫的《語言自邇集》是西方世界正式出版的最早的代表性華語文教材，那麼，比《語言自邇集》成書還早了整整五百多年的古代韓國漢語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不僅是東方國家中最全面具備外語或第二語言教學特點的漢語教材，還可被視作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

比較正規、完整的華語文教材。今天，隨著世界華語文教學持續不斷的升溫和發展，帶來了對華語文教材需求之迅速增長。我們要擴大教材的品種和數量，提高教材的質量，就必須加強對古今中外華語文教材的深入瞭解和全面研究。然而，當今眾多年輕的華語文教師恐怕對古代外國的漢語教材還不太熟悉，或以為跟我們今天的華語文教學關係不大。其實不然，不妨讓我們一起來重溫和研究一下《老乞大》和《朴通事》，也許可藉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溫故知新、推陳出新，對發展今天的華語文教學，特別是推動華語文教材的研究和編寫，不無現實意義。



貳、《老乞大》和《朴通事》在華語文教材史上的歷史定位

無論在韓國的漢語教學史上，還是世界上以漢語作為外語的教學史上，特別是外國人學漢語的教材史料中，古代朝鮮的《老乞大》和《朴通事》兩部經典漢語教材，其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在地域上已跨越朝鮮半島而具世界意義，在學術上已超脫僅僅是古代韓國人學華語的教科書，而富珍貴的漢語研究及漢學研究的史料價值。關於這個課題，筆者於 2000 年 6 月在參加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的“對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漢語教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威妥瑪〈語言自選集〉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學術發言，認為《語言自選集》是早期西方漢學家撰寫的一部在西方世界影響最大的（對外）漢語教材，該書初版於 1867 年，正是中國清王朝時期，距今一百幾十年。而《老乞大》和《朴通事》則成書於大約西元 1346 年至 1368 年間中國元朝滅亡、明朝初建時期，也即比《語言自選集》早了整整五百多年，距今六百餘年。因而，它們理所當然應被列為世界上最早的比較系統和完整的、並具現代語言教學概念和功能意義的漢語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教學的經典教科書。

雖然兩書的著者及著作年代至今尚無確切定論，但推斷其初現於元末是有一定根據的。如教材中寫到了高麗和尚步虛在成南永寧寺說法一事，據史料記載此事發生在元朝至正六

年，即西元 1346 年；再如朝鮮古籍《成宗實錄》十一年十月乙丑條記有對這兩部教材中語言的評語：“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並提議“選其能漢語者刪改《老乞大》、《朴通事》”。確實，倘將兩書中的語言跟元曲中的說白對比，便可發現何其相似乃爾。由於兩書最初是用漢語寫成的，對於一般老百姓學用確有困難。故至李朝中宗時（約 1515 年）漢學家崔世珍把兩書譯成朝鮮語，並用“訓民正音”給漢字注音，合編成《老朴輯覽》。後再由邊暹、朴世華兩位元學者根據《老朴輯覽》又作考校訂正，編成《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先後于顯宗十一年（1670 年）和肅宗三年（1677 年）問世，即今所見之《老乞大》、《朴通事》兩書之全貌或全本也。當時的漢學家李聃命在《朴通事諺解》作序云：

“自此習華語者不患無良師，其為國家通梯航、馳玉帛之助又豈薄乎云爾。”今天我們再作研究，更可發現兩書的學術成就是多方位、深層次的，是漢語研究特別是華語文教材史研究的一座水源豐沛的“古井”，它們的歷史價值至少可從漢語史尤其是漢語口語史和漢語言文字學、社會學和文化學、華語文教學特別是世界華語文教材史等幾個方面來進行考察和研析。

參、由漢語口語史和漢語言文字學的角度分析

鑑於兩書的會話體形式，突出口語教學，並且主要記錄了中國的北方話或北方音，書中會話語言實際都是北京口語，似元曲中說白的

話語。正如當代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呂叔湘先生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中所指出的：“《朴通事》和《老乞大》，從這兩種書的內



容可以判斷那裏邊寫的是北京口語，可見這種口語已經被外國人承認是漢語的代表。”（羅常培、呂叔湘，1981）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的國語“普通話”被確立為現代漢語的標準語，並規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看來不僅在一百多年前被西方漢學家如威妥瑪《語言自選集》（該書也記錄了當時的北京口語）所“採用”和“推廣”，其實更早在五六百年前就已被東方朝鮮漢學家及其《老乞大》和《朴通事》所“預見”和“推行”了。又由於兩書的寫成、傳抄、印行、修訂、注釋、翻譯等歷經中國元、明、清三個朝代，從而反映了這一漫長歷史時期漢語口語特別是北京話在語音、辭彙、語法等方面演變和發展，從而為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古代漢語口語的發展變化等，提供了極為難得、珍貴的實錄語料。

漢字是朝鮮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中韓兩國的“文字之交”源遠流長，今天回顧，跟我們的華語文教學關係密切，在此有必要作一些考釋。據戚雨村（1988）主編《語言學引論》引證，遠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西漢末期，漢字已開始傳入朝鮮，至西元4-5世紀，漢文已成為朝鮮的書面語通用於高句麗王朝。後又在此基礎上，逐漸利用漢字的音或義來標記朝鮮語的書寫形式，並先後採用過“鄉筭”、“吏讀”、“口訣”等不同方式和名稱。“鄉筭”源於西元5世紀，用漢字記錄朝鮮語的讀音，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假借，漢字的作用相當於今天的中文拼音，這裏的漢字（漢文）是毫無意義的，如“拜內乎隱身萬隱，慕呂白乎隱佛體前衣”（意為“我拜菩薩，在我尊敬的菩薩前”）。“吏讀”起於7世紀，亦稱“吏道”、“吏頭”、“吏吐”，是西元692年新羅學者薛聰等人所創制，用漢字音或意來標記朝鮮語的一種方法，但遵循朝鮮語的詞序，實詞多用

漢語，虛詞則多用朝鮮語，是一種不完全的假借，可作為一種輔助文字。雖其文字標記法並不完善，但還是大大方便了朝鮮人用朝鮮語對漢文書籍的閱讀和講解，故“吏讀”持續使用了較長時期，實際上成了以後“諺文”出現的先聲和前提。“口訣”始於8世紀以後，是在漢文原文的字裏行間加上朝鮮語的虛字或個別筆畫，起到幫助訓讀的作用，故“口訣字”有些相當於語助詞。實際上，在古代很長一個時期中，朝鮮使用漢字的數量幾乎跟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相等，這是一個何等令人驚歎的數位，足見漢字在古代朝鮮被流傳、應用之廣。

直至朝鮮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當政的15世紀，一批著名漢學家和朝鮮語文學家如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崔桓、朴彭年等，在研究了漢字和吏讀的基礎上，並參照中國的音韻學原理，於西元1443年12月創制了《訓民正音》的音素文字，從而解決了語言文字不一致的困惑和弊端。正是這一又稱“諺文”的文字之間世和使用，開創了朝鮮民族有了自己本民族文字的新紀元。到1527年，又一位著名漢學家和語文學家崔世珍編纂了《訓蒙字彙》等十餘部著作，對“諺文”又作了改進，使之更便於運用。即使如此，由於朝鮮語詞彙中的文化、學術辭彙幾乎完全由漢字詞語構成，因而漢字在朝鮮文中仍然佔據著主要地位，“諺文”這種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還一直居於輔助地位。差不多歷經約五百年的緩慢變遷，到了19世紀末，朝鮮書面文字終於發展成朝漢兩種文字並用的形式，即漢字語仍使用漢字；而固有語、虛詞及詞尾變化則用諺文書寫。進入20世紀中葉朝鮮半島分治後，朝鮮北方於1954年重訂了諺文字母表，並決定不再夾用漢字，後考慮到實際需要，自1968年始又從中學一年級起進行漢字教育；韓國也曾於1968年宣佈在教科書中



全部廢除漢字，但可能由於韓語同音詞問題不好解決，而漢字則恰恰具有區分同音詞的優點和方便，故韓國又於 1971 年重新恢復漢字教育，近年來更不斷有學者和教育、學術團體呼籲應擴大對漢字的使用。

關於中韓兩國的“文字之交”，據有關權威統計，韓語中存有大量的漢字詞，以《韓國語大詞典》為例統計，在該詞典 257,853 個詞中，漢字詞為 178,745 個，占 69.32%；韓語固有詞有 62,912 個，占 24.4%；外來詞為 16,196 個，占 6.28%。這些漢語詞的詞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數詞和量詞等，種類繁多，且大部分是漢代以前的基本詞。甚至連佛教經中國傳入朝鮮後，大量的漢字佛教詞語也為朝鮮語所吸收。再者，朝鮮語中的漢字成語之多也是其他民族語言所少見的，據北朝鮮科學院 1962 年出版的《朝鮮語詞典》的統計，共收入包括引進的及獨創的漢字四字格成語多達四千餘條。此外，在近、現代，朝鮮語還間接從日語中吸納了許多漢字詞，儘管其中不少詞是同義異形，即現在韓語跟漢語各用不同的漢字來表述同一個意思，如“片紙”與“信”、“子息”與“孩子”、“弄談”與“玩笑”；還有的漢字詞今天只用於韓、日語中，如“片道”（單程），“不具者”（殘疾人），“放

送局”（廣播電臺）。鑑於漢字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及客觀存在的現實功能，今天“漢字文化圈”的韓國、日本的語文學界又開始重新加強了對漢字結構、功能等的研究。又鑑於自漢唐以來漢字不斷向周邊民族傳播並在歷史上曾是一些國家共同使用的文字，從而使漢字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國際文字”性質的史實，就有韓國學者提出今天應將漢字更名為“東方文字”，使其真正成為一種名符其實的國際文字。

縱觀歷史，漢字能自古通行於朝鮮是跟歷代王朝對漢字的大力推廣和傳授分不開的：國家設置了專門教授漢字漢學的機構，如高麗的“太學”、新羅的“國學”等；同時又鼓勵民間辦學，如顯宗時侍中崔沖首建人稱“海東孔子”的私學等，形成以中央官辦為主體、民辦為輔助的教育網，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在近五六百年內，可以說主宰古代朝鮮中文教學的就是《老乞大》和《朴通事》這兩部教科書。上面之所以不吝篇幅詳述了漢字在古代朝鮮被長期使用並對產生朝鮮自己的文字所起之巨大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為了表明《老》、《朴》在客觀上還對推廣和研究漢字以及對後來在東方和亞洲推動形成所謂“漢字文化圈”立下了豐功偉績。

肆、由語言與文化的角度分析

《老乞大》和《朴通事》兩書真實記錄了元、明、清三代中國社會文化、人情世故的方方面面，並不時結合本國高麗社會的狀況予以描述和對照，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朝鮮的歷史、社會、文化，客觀上記載、體現了韓中兩國在古代一個相當漫長歷史時期中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情況。具體內容涉及了哲學、倫理、政治、歷史、經濟、宗教、文學以及民

俗風情習慣，乃至成語典故俗話等，應有盡有，幾乎無所不包，並特別貼近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可貴的是書中選材十分細微精緻生動，且善惡褒貶兼敘；雖以口語為主，又能文白兼顧，從而達至實用易學、雅俗共賞。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諸如：中國古代城市的商貿繁華、貧富懸殊，農村的水旱災害、饑荒盜賊；人們的飲食風味、衣著服飾、婚喪嫁娶、娛樂消遣、歲



時節氣乃至中醫中藥；中國歷代散文、戲劇、小說等古典文學的摘錄引用也常見書中，如《朴通事》中有一篇課文講“車遲國”的故事，據考即為早已失傳的《西遊記評話》的片段，成為後來學者們研究該評話的重要資料和依據，這就為漢語的語言與文化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了作為一本漢語教科書的價值。我們還可在書中看到：高麗人在中國旅行、經商以及立契約、打官司的情況；也有朝鮮學子在中國購買《尚書》、《四書》、《毛詩》、《周易》、《禮記》等古籍的情景；甚

至在《朴通事》的書末，還有高麗秀才敍述高麗王朝建國歷史的介紹等等。

倘再作深入挖掘，便可發現兩書對從語言的啟蒙教育到文化的研究，其內涵相當深邃，且外延也無比廣闊，難怪不少學者只要一接觸這兩本書，就會十分感慨讚歎：“稍微涉獵，如入寶山。”限於篇幅，除關於正確處理語言教學與文化滲透的關係及漢、朝文化對比方面，下文還會有所涉及外，本文不再就此作進一步詳盡論述。

五、由華語文教材史的角度分析

《老》、《朴》在這方面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更是無可替代，這也是本文要重點探討的。說實話，大概除韓國同行外，我們過去對這兩部古代經典漢語教材的注意、研究和認識都很不夠。而它們經幾百年流傳使用及在充實改進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影響，即使在高科技時代的今天，對我們華語文教學特別是華語文教材的建設，仍然深具藉古啟今的作用。倘考察華語文教材史，正如已故張清常先生在《〈對外漢語教法學〉序》中所言：“對外漢語教學在歷史上的材料非常難找。固然由於文獻記載不多，根本上還是古人未予重視而順其自然。”（張清常）我們固然可以從最早的典籍如《周禮·春官》、《禮記·王制》、《說苑·越人歌》、《漢書·白狼王歌》等古文獻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最早的漢外對照譯文而已。佛教自西漢傳入中國後數百年間，出現了大量的佛經梵譯漢，晉代僧人、翻譯家道安甚至總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但那仍然只是最初的翻譯理論和梵、漢語言對比研究。到了西夏乾祐21年（西元1190年），出了一本題為《番

漢合時掌中珠》的材料（1909年在中國黑水城遺址出土，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僅有第7頁至第17頁共10頁，收有西夏文詞語和漢文詞語各266個，大概是迄今發現的最早使用學習者母語為媒介語的番漢兩用“教材”），實際上這是一種雙語對照的辭彙手冊（這類辭彙手冊在元代還有《至元譯語》、明清時又有《華夷譯語》等），它們當然會有助於第二語言學習之用，是對過去只能借用第一語言教材來教第二語言（如外族人借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漢族識字課本來學漢語，且主要是學習漢語書面語或文言文）的一種跨越，故最多只能看作漢語第二語言教材的雛形。由此推衍尋考，大致可以將《老乞大》、《朴通事》推定為真正具備第二語言教材基本特徵的最早的華語文教材。有人將歷史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材的發展過程概括為三種模式，也即三個發展階段：

- 一、以漢語作為目的語與學習者母語的雙語詞彙對比為參照的“準教材”階段；
- 二、以課文特別是突出口語會話為中心的教材階段；



三、以語法結構及語言學理論為指導的教材階段。

筆者以為，這樣的劃分還是比較可取的。這第一階段，即剛提到的以《番漢合時掌中珠》等為代表的辭彙手冊，恐怕還不能算今天嚴格意義上的第二語言教材或對外漢語教材。至於第三階段，則是在西方語法翻譯法語言教學理論影響和借鑑下而出現的教材，在國外可以威妥瑪《語言自選集》為代表，該書實際上既以口語教學為中心，同時又輔以語法指導，也是

漢語語法最早被一些西方漢學家和語言學家仿西語“如法泡製”出來並被編進漢語教材的，自然最符合西方人學習外語的習慣；在中國今天則以 1955 年朱德熙先生在保加利亞教漢語時自編的《華語教材》（手稿）及 1958 年北京大學正式出版的新中國第一部對外漢語教材《漢語教科書》為代表。而標誌第二階段的開始及其最權威的代表作，那就非《老乞大》和《朴通事》莫屬了。

陸、《老乞大》和《朴通事》乃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的對外漢語教材之鼻祖

首先，《老乞大》和《朴通事》兩書體例都以課文為中心，並採取會話體形式突出口語教學，不僅有辭彙，還有句子，且句式由簡單而複雜，由單句到成段乃至成篇。一般說，是否形成課文為教學的主體或主要依據，是能否成為正式教材的一種重要和基本的標誌。而《老》、《朴》完全具備了，兩書的差別僅在內容篇幅和程度難易方面，倘《老》是初級口語教材，《朴》則為中級或高級會話課本了。如《老》上卷中的句子：“大哥，你從哪里來？我從高麗王京來。如今哪里去？往北京去。”

（標點符號為後加，原文沒有，下同。）都是非常簡練上口的短句。再看《朴》的開篇就是文繆繆的傳統“套話”或口頭禪：“當今聖主，洪福齊天，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即使書面語，如課文中的某些應用文體，也不像經書語言那樣艱澀深奧，而是當時較為流行的淺近文體，仍然強調、體現其交際實用性。

其次，借助學習者母語作為媒介語進行雙語對比和翻譯注釋，也是第二語言或外語教材的常用手段和標誌。《老乞大諺解》和《朴通

事諺解》同樣都具備了：每個漢字下面都有兩種母語諺文注音，且每句末尾還配以諺文翻譯，從音、義、字、句各個方面為課文作注譯，比那種單純的詞語對譯及漢字注音更全面正規和實用有效。更可貴的是，《諺解》還提供了不少今天我們語言學理論中一些構詞理據、文化語言學及語言國情學的知識。如《朴通事諺解》卷上第一節在“做一個賞花筵席”後注曰：“凡宴會常話曰筵席，文話曰筵會，吏語曰筵宴，蓋取肆筵設席之意。”又在“張三買羊去”下注云：“三，或族次，或朋友行輩之次，或有官者職次相呼，或稱為定名者有之。李四、王五亦同。”這雖是傳統語文學的詮釋語義之法，但這裏更注重文化、國情方面的知識，顯然是充分考慮到了漢語作為外語學習的需要，也高度體現了作者編寫的匠心，似乎對華語文教學的特點和規律有相當的領悟和把握。因而，《老》、《朴》兩教材這種逐字逐句翻譯、注釋的外語教學法，不僅完全可跟西方國家流行於十八九世紀的翻譯教學法（如《語言自選集》等）媲美，且更難得的是還整整提



前了好幾個世紀。

再者，創造語言環境，類比交際情景，重在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也是現代口語教材注重實用性、實踐性原則的必用方式。雖然那時尚無所謂“情景教學法”、“功能教學法”、“交際性原則”等語言教學理論，但《老》、《朴》卻不謀而合大師所見略同地早早付諸實踐了。兩書以高麗商人在中國旅行、經商為縱線，以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諸題材為橫線，經緯交叉地編織成幾十個話題（《老》書上下兩卷共 108 節，即 108 篇課文；《朴》書上中下三卷共 106 節），且每節（課）內容相對獨立，但節與節之間又互有關聯，把一個個故事串起來，頗似今天的電視連續劇。《老》書甚至還設計了幾個主要人物貫穿全書：兩個高麗人跟四個來自遼陽的中國人相遇在去北京的路上，同路人成為朋友，一起趕路、投宿、吃飯、餵馬，一起談生意、談家庭、談國情，隨後在北京生活，從而經歷了不同場景，引出了不同話題。兩書中出現的人物從書生官人到工匠自隸，三教九流應有盡有，因而人物語言極其生動，甚至不乏詈語粗話，如“那廝”、“驢養下來的”、“我敬他什麼屁”、“夾著那屁眼東走西走”等。由於人物各具個性，故事各有奇趣，語言各顯其用，話題的廣泛性、連續性、趣味性，語言的通俗化、生活化、實用化，新詞語和新句式不斷自然帶出，使學習者非常易於“活學活用”，十分有利於交際技能的培養。倘若不看其古代的社會內容和背景，這跟今天我們編寫出版的各類口語會話教材幾乎如出一轍。因而，《老》、《朴》雖基本上是傳統語文學的辨音、識字及翻譯法的教材，但說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朴素的“情景法”、“功能法”等現代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法的基本特徵也決不為過，殊屬難得。

最後，正確處理語言教學與文化滲透的關

係，包括目的語文化跟學習者母語文化的對比，既主（語言）次（文化）分明，又有機交融，達至互補互動，這是衡量語言教材質素的又一重要標準。幾年前在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界曾有過關於如何處理好所謂“交際文化”和“知識文化”關係的大辯論，且一般認為“知識文化”原則上不在對外漢語教學的範疇內。即便在這個問題上，《老》、《朴》於“無意間”並在客觀上處理得也是相當出色的。如關於漢語的各種親屬稱謂，是比較難教的，外國人一般不易一下子弄清楚，但《老》、《朴》卻能“四兩撥千斤”。如教“姑舅兄弟”關係時，問：“誰是舅舅上孩兒？誰是姑姑上孩兒？”答：“小人是姑姑生的，他是舅舅生的。”將漢語中複雜的關係十分具體、形象地交代清楚，這算是“交際文化”的教學。還有篇講“打水”的課文，就先說中國的井深，是磚砌的，皆男人打水：“將灑子提起來，離水面擺動到撞入水去，便吃水也”；再講到高麗的井淺，是石頭壘的，男人不打水，都是婦人打水：“著個銅盃，頭上頂水”，這是在文化對比中稍帶著“知識文化”。而更豐富一些的“知識文化”介紹，則多見於“中高級”程度的《朴》書中，什麼春節、端午節、娶親、生孩子、上墳、祭社神，以及諸如中秋月會、午門操馬、打球摔跤、勾欄雜技、放債還帳、北京城門、普陀佛事，乃至放風箏、鬥鷄鵝、踢毽子、買緞子、寫狀子、洗澡堂、和尚偷媳婦等華夏古風、民間習俗，如滾雪球似的逐漸帶出。正是通過對這些傳統文化、民俗風情等的融會介紹和巧用，體現並傳播了中國的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理念，從而使這兩部漢語教材的人文價值擴展、上升到漢學的層面，確實彌足珍貴。

綜上所說，《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史上，尤其在世界



華語文教材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由辭彙手冊類的“雛形教材”向以課文為中心的“成形教材”過渡中，具有轉折和開創性的意義。正如程相文《〈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漢語第二語言教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所概括的：“（兩書）實現了漢語第二語言教學的三大轉變：1) 從辭彙教學為中心到課文教學為中心的轉變；2) 從書面語教學為中心到口語教學為中心的轉變；3) 從語言要素教學為中心到

語言交際技能教學為中心的轉變。總之，實現了從母語教材到專門的第二語言教材的根本轉變。”（程相文，2001）

縱然傳統的東西也許較為粗糙，但“粗糙”卻可能是渾金璞玉。因而兩書的歷史價值對今天的世界漢語教學特別是華語文教材的研究和編寫，仍具參考、啓示意義，是極其珍貴難得的歷史遺產。



參考文獻

- 田惠剛（1998）。“漢字文化圈”的形成、演變與展望。
漢學研究第三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
- 吳淮南（1995）。作為外語的漢語口語教材〈朴通事〉和〈朴通事諺解〉。**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許 壁（韓國）（1997）。朝鮮語中的漢字詞---論漢語和日語對朝鮮語的影響。**對外漢語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論文集**。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 張德鑫（2001）。戚妥瑪〈語言自選集〉與對外漢語教學。**北京中國語文**，2001，5。
- 張清常（1988）。**對外漢語教法學**（序）。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程相文（2001）。〈老乞大〉和〈樸通事〉在漢語第二語言教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漢語學習**，2001，2。
- 戚雨村（1988）。**語言學引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劉明章（1995）。朝鮮歷代漢語文教學與研究考略。**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羅常培、呂叔湘（1981）。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現代漢語資料選編**。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

致謝

承蒙北京語言大學圖書館的關照，讓筆者借閱了館藏孤本《老乞大》和《朴通事》，並對書中某些章節提供了複印資料，為本文的寫作給以極大的便利和幫助，特致深切謝意！

為使本文能符合《師大學報》編排之格式，筆者還要特別感謝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曾金金博士所給予的諸多幫助。

作者簡介

張德鑫，中國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教授

Zhang Dexin is a Professor in the China National Offi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eijing, China.
 E-mail: zhangdx@163bj.com



LAO-QI-DA and *PIAO-TONG-SHI*: Their Role in the History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Zhang Dexin

National Offi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a

Abstract

LAO-QI-DA and *PIAO-TONG-SHI*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textbook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They were compiled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round 1346A.D.) for Koreans to learn Mandarin Chinese.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was recorded in the books. They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Compiled over 650 years ago, these two books have contributed to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including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teaching methods.

Keywords: earliest textbooks for Chinese learning, important materia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